

基督教與中國近代女子盲人教育

郭衛東*

20世紀80年代以來，對基督教來華歷史的研究在中外學界形成一個小高潮，至今方興未艾，特別是對基督教會在華興學史的研究更是引起學界的特別興致，成果累累。相形之下，特殊教育史在教會史的研究中處在極邊緣位置，學者們多注重高等教育，甚少是普通教育的研究，對特殊教育尤其是女子特殊教育的研究則無人問津。本文以基督新教與中國近代女子盲人教育為研究對象，考量晚清至民國年間盲女教育的大端。實在說來，教會與中國近代特殊教育有着特別關係，尤與新教為然，不搞清楚，一部中國近代特殊教育的多彩歷史便是盲區。

1784年，胡威（Valentin Haüy）在巴黎設立了世界上第一所盲校⁽¹⁾，標誌着正式盲教育的開始，盲教自此步入學校化的軌轍⁽²⁾。隨後，在這所學校又誕生了近代實用盲字體系，其創製人是法國盲教育家路易·布萊葉（Louis Braille），他於1829年發明了用凸出點編碼供盲人摸讀的現代點字法，從而使盲教育發生革命性變化。而維也納人比爾（Georg Joseph Beer）則將眼病治療從既往理髮師和江湖遊醫的營生範圍內脫出，使之發展成為近代醫學中的一門獨立學科。⁽³⁾同一時代，英國哲學家洛克（John Locke）揭示感覺論的基礎；法國思想家盧梭（Rousseau）闡釋了視覺與觸覺和聽覺等感覺之間互換的可能。這些啟蒙家的理論成為特殊教育的一個轉折。自此，面向殘障人的特殊教育，與人性尊嚴意識、人權神聖意識和人類平等意識不可或分地聯結到了一起，它徹底改變了古人視殘障人群為神靈對人類的懲罰、將其歸入另類加以歧視甚至虐待的不人道觀念。人類的文明形態因特殊教育的出現而邁進了一大步。

中華女子特殊教育之濫觴

19世紀30年代，由歐洲發軔的近代盲教育在國際人士的推動下開始落戶中國。但與歐美有別的

是，中國近代特殊教育從受教群體來說是從女性開始。從所能查閱到的資料來看，中國最早對盲人施行近代方式特殊教育的地點是在澳門，而其創始人則是基督教新教傳教士。自康熙朝的“禮儀之爭”後，有清一代歷康、雍、乾、嘉四朝以至道光朝的前期均實行“禁教政策”，基督教進入中國大陸被視為非法。自明末以後，中西雜處的澳門於是成為教會試圖在華謀得發展的落腳地，成為中西文化交會的處所，也理之當然地成為教會特殊教育的最早起源地。

1834年，普魯士籍傳教士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入澳門，其夫人 Mrs. Gutzlaff 隨行，次年9月30日，在“印度與東方女子教育促進會”（The Ladies' Association for Promoting Female Education in India and the East）的贊助下，設“澳門女塾”（附帶招收男生），這是外國教會在華創辦的第一所具近代範式的學校，該校後又獲“馬禮遜教育會”（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的支持，進而成為後來影響甚大的“馬禮遜學堂”的前身。⁽⁴⁾1839年，女塾停辦。曾在塾中就讀的容閱記載：“其後此塾因故停辦，予等遂亦星散。古（郭）夫人攜盲女三人赴美，此三女乃經予教以凸字讀書之法。及予輟教時，彼等已自能誦習《聖經》及《天路

*郭衛東，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歷程》二書矣。”⁽⁵⁾這是我們所見到的教會在華招收盲女授教的最早記錄，反映了新教在華辦學之初，就已經向殘障女性打開了受教育的大門。⁽⁶⁾當然，教學方式還不能說是先進，主要是採取學生教學生的方法，教學內容也主要局限在宗教方面。再有，容閱關於郭夫人攜盲女赴美的記錄也有偏差，據考，郭夫人離澳後走避的地方並不是美國，而是馬尼拉。⁽⁷⁾這些盲女的人數和經歷也有不同說法。

據 19 世紀後期在華的傳教士庫壽齡 (Samuel Couling) 編著的《中國百科全書》(*Encyclopaedia Sinica*) 稱：“郭士立曾援助了六名廣東的盲女，其中的兩位到了美國，其餘四人去了英國。”庫壽齡的書流傳不多，筆者未能覓得。筆者所見到的是美國基督教傳教史研究的權威賴德烈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在其代表作《基督教差會來華史》(*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 中所轉引⁽⁸⁾，這幾位盲女後來結果如何，賴德烈的書中未提及。

後來，傅步蘭 (George B. Fryer) 對此事有進一步交待：“盲校之設，創自歐美教士，於 1840 年教士某得瞽女六人，遣二人至美國，四人至英，受適當之教育。其至英國者，有一人返國，充寧波瞽人院院長。”⁽⁹⁾傅步蘭在同年的《中國差會年鑒》(*China Mission Year Book*) 上對此有更具體地記述：“中國的盲人教育，由郭士立博士所開創，當時，郭氏在廣東救助了六名盲女。她們中的兩位被送往美國費城的學校 (傅步蘭稱：數年前傅曾有幸在美國見到過這兩人)，其他人被送往英國倫敦，她們中的一位隨後返回中國，協助安得薩 (Aldersey) 小姐在浙江寧波辦學，其餘的三位也陸續故去。”⁽¹⁰⁾

如此說來，澳門女塾的盲生後來還有助於寧波的教育事業。此事亦非空穴來風。1840 年 7 月 6 日以後，英國軍隊曾兩度數年佔領寧波的舟山，並在島上實現佔領區統治，專門成立了殖民當局——巡理府，宣佈島上的所有民政、財政和司法管理均由英方執行。⁽¹¹⁾有意思的是，傳教士郭士立就曾擔任“舟山行政長官”，正是這段時間，他在島上設立了復書院、育嬰堂、苦老院、養濟院等機構。不知傅步蘭所言寧波瞽人院是否與此有關。再，郭士立與

前澳門女校本有淵源，關注此方面的情况也屬情理中事。另，文章作者傅步蘭為上海福啞和盲童學校校長，又是聖公會福州靈光盲校的監督，其先君則是上海盲童學校的創辦人，即大名鼎鼎的英國聖公會 (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傳教士、近代中西科技文化交流史上的重量級人物傅蘭雅 (John Fryer)。傅步蘭本人又曾長期“從事調查全國盲童學校事業”，對情况頗為熟悉⁽¹²⁾，所言當有根據。但寧波的情况畢竟未見其它記錄，傅步蘭文還是語焉不詳，此事仍須待考，為慎重起見，存留此案祈備識者考查。

不管怎麼說，澳門女塾以盲女為教學對象，凸字法又是近代的盲字法，其開中華近代盲教育乃至盲生留學教育的先河當可認定。不過，從嚴格意義上講，澳門女塾不是專門的盲校，盲女在其中也不是正式學生，祇是附讀。⁽¹³⁾所以，這祇是在施行特殊教育，尚不能算是中國專門的特殊教育機構的出現。⁽¹⁴⁾基督教會在華創辦正規特殊教育機構還是 19 世紀 70 年代以後的事。而針對盲女的特殊學校的湧現是在 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初。

基督教在華盲女教育機構舉要

1900 年，“世界基督教普世大會”於紐約召開，會上，美國長老會 (Presbyterian Church, U.S.A) 代表懷特夫人 (Wellington White) 有一番極動情感的發言：“我很難向您們解釋中國失明女童的真實生活情况。我抵達中國後的一個晚上，哈巴 (Happer) 夫人和我一起在前面的門廊，當我們站在那兒的時候，有十六個盲人女孩從街上走過，一個明眼的老年婦女手持樂器邊走邊唱引領着她們，每個盲女都用手搭在前面的同伴肩上，魚貫而行。她們衣着豔麗。哦！魔鬼撒旦總是在夜晚穿着的那般漂亮。她們的臉蛋粉飾塗抹着，頭髮也經過精心裝束，一切都經過收拾打扮。但是，當你仔細觀看她們的時候，會發現她們全都是盲人。那個年老的婦人走在她們前面，帶領着她們的軀體和靈魂，這些盲女走在街頭，時而演奏樂器，時而以淫蕩的言辭大聲招

攬路人到她們那兒去玩。”⁽¹⁵⁾這便是特殊教育興起之前中國盲女的悲慘寫照，也是促使諸多教會人士投身盲女教育的重要動因。

一、廣州明心瞽目院（Meng Sam School for Blind, Canton）

中國第一所專業盲女學校出現在廣州，1891年10月成立⁽¹⁶⁾，該校也是華南地區的第一所特殊教育機構，“中國之南，有瞽目學校數處，而以廣州明心學校之開辦為最先。”⁽¹⁷⁾學校創辦人馬西（Mary Niles），1882年以傳教醫生的身份來華後在廣州博濟醫院工作。“很快她就被那些數量眾多生存條件極為惡劣而又孤苦無助的盲童們的境遇所牽動。”⁽¹⁸⁾1889年，馬西收養瞽目幼女四人，送醫院附設的女塾讀書，後人數續增。盲女們與正常的女孩同受教育對兩方面都感到不適，為日漸增多的盲女們開辦專門女校的事宜變得突出起來。這時正好提供了一個機緣，1891年的一天，馬西被召到清朝兩廣總督的家中，此時，總督的一位妻妾患有重病，總督久聞馬西的高明醫術，又因馬西是女性，診視方便，故而邀其到府出診。治療完畢後，總督甚為感激，表示願意為馬西提供幫助，這是可遇不可求的機會，馬西立刻毫不猶豫地提出要求總督為盲女們捐錢建校。不到一個星期，馬西收到總督轉交的一千圓錢，“開始為盲女建家”⁽¹⁹⁾。

盲校招收由各地教會保送的失明青少年。1892年，學校在廣州仁濟街租房，聘請德國巴陵會（Berliner Missionary Society）的瞽女出任教員，“教授凸字，以瞽訓瞽，實自此始”⁽²⁰⁾。還有巴陵會的德國籍傳教士葛特凱（R. Gottschalk）也被邀請來校，將“布萊葉盲文”與地區方言結合起來講授聖經。⁽²¹⁾盲校除開設盲文、音樂、編織等課外，福音和衛生也是重點課程，這與博濟醫院的因緣不無關係。學校創辦之初，條件有限，“溯明心開校之始，房舍隘陋，堅以決心，持以毅力”，方得以延續發展⁽²²⁾，進而成為近代外國教會在華設辦的規模較大的殘障教育機構。

盲校開辦後，影響漸被，有愈來愈多的盲童父母都願意把孩子送進學校，社會上也獲得良好

口碑，於是，廣東警察當局在1912年6月時造訪該校，提出要將警方從一些不道德的場所中解救出來的操“彈唱賤業”的盲女安置在校，希望校方予以協助。同時，政府可以將這批瞽女的改造經費轉撥明心，作為“月資經費”。⁽²³⁾經過雙方接洽，學校答允接受。8月的一個下午，警方帶來了六十六個女孩，“這些盲女衣着檻縷，渾身骯髒，佈滿了蝨子臭蟲之類，因饑餓而面容憔悴。孩子們到校後，受到溫暖關愛，為她們洗了澡，換上了乾淨的衣服，提供了食物，特別是為她們過去那黑暗的世界開啟了光明的大門。”⁽²⁴⁾學校也漸次發展成具有幼稚園、初級小學和高級小學的系列教育機構。⁽²⁵⁾

馬西在華從事此項工作總共有三十九年之久，並因此而獲得崇高的社會聲譽。1917年，她的母校——美國埃爾邁拉學院（Elmira College），給予她最高的榮譽，頒授法學名譽博士學位。1928年，她已過七十高齡方才退休。⁽²⁶⁾抗日戰爭時期，明心盲校在廣州淪陷後仍由教會繼續辦理，抗日戰爭勝利後增辦初中。該校1951年被民政部門接管，改為公立的社會福利機關。⁽²⁷⁾

二、福州盲女書院（Blind Girls' School, Foochow）

由英國聖公會女部（Church of England Zenana Mission Society）的司蒂芬（E. Stevens）等創建於1900年。⁽²⁸⁾學校的創辦很是偶然。這年有十二名“窮困異常的盲女”，被父兄和親戚帶領着，央求教會方面予以收留，說若不收留，將無路可走，祇能流落街頭，沿街乞討。“使得教會無法拒絕。靠主的旨意，教會收留了她們，把她們從原先所處的那種死亡的邊緣和悲慘的境遇中搭救。”⁽²⁹⁾以此為契機，學校開辦起來。因時間倉促，初時學校既無校舍，也無資金，直到1905年，學校才在福州南臺設立校址。⁽³⁰⁾各項教學安排也漸行展開，早期的課程以聖經為主，學校利用“布萊葉盲文法”進行教學，大英聖書公會（The British Bible Society）也向學校提供了多種版本的盲文聖經，師生們“勤於研究，善於背誦”。學校同時教授女紅、縫紉、紡織、編

織等技藝，還進行家政訓練，為她們以後的成家立業着想。⁽³¹⁾到1913年時，學校已“有大的紅磚砌就的建築，能夠容納五十名以至更多的盲人女生”⁽³²⁾。而最初的那十二名女孩，“都完全脫離了死亡的邊緣，還有些結了婚，其中的大部分成了基督徒”⁽³³⁾。1929年，女校在“中國化”方面有了決定性的轉變，“年來對於校務之發達，可謂隨時代之變遷而演進。其最顯著者，即為校務劃歸與華人主持，如福建聖公會主教會議負責管理該校是也。新近且組織一慈善事業委員會。至學校本身方面，現時雖仍由西人任校長，實際上任管理之各職員，多以易華人擔任。故將來必全由華人主持校務是無疑也。”學生也增至八十人。⁽³⁴⁾1951年7月，該校與其它學校合併，更名為“福州市盲人學校”⁽³⁵⁾，成為教會遺留給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有用資源。

三、九龍心光書院 (Blindenheim School for Blind Girls, Kowloon)

香港九龍心光書院實際在19世紀末就已開始醞釀。⁽³⁶⁾曾有文記述該院的緣起：1890年，知名華人牧師王煜初曾作〈中華瞽女訴苦文〉，講述中國盲女的悲慘狀況，引起很大反響。“本院所以創立者，是緣王煜初牧師曾為本族盲女訴苦，故收養此等女子，教其習有用之學術。”⁽³⁷⁾1892年，德國喜迪堪會 (The Hildesheimer Verein für die Deutsche Blinden Mission in China) 的幾位人士組成一個對中國盲人進行援助的團體，以宣傳救助盲女為主要任務。1896年，喜迪堪會在香港也籌建了類似機構，最主要的成員有馬薩·帕斯特 (Martha Postler)。一年後，馬薩等人在港島收容四名流浪盲女並開始教育，後因動亂和瘟疫等原因 (19世紀末，香港數度發生嚴重的鼠疫流行)，機構輾轉遷至澳門 (穗港鼠疫流行時，澳門染病極少，獨成一方淨土⁽³⁸⁾)，後又遷回，多有變動。1901年，喜迪堪會正式創建“瞽女書院”，盲女們被“授以普通各學”。該校除教育功能外，還兼有收養功能，祇要是女性，不分年齡，從嬰兒到成人均可入書院，故而，書院陸續設立了從幼稚園、而初等小學、而高等小學的教學體系，並設聖經傳道部和工藝部。在

工藝部中，學生們製作外衣，這些衣物有的拿到香港等地出售，以此給學生的家庭增加一些收入。⁽³⁹⁾

1904年的7月22日，馬薩嫫嫫因染痢疾過世，留下遺言：“我幸福地生活過，也將安祥地離去。”九龍書院後由斯赫斯特 (Agatha Von Seelhorst) 等主持。1911年，書院在九龍馬頭角 (即土瓜灣) 建設校舍，此時，學校已有盲人女生八十七人，“能學寫字、讀書、算數、地理、組織，與夫自理梳洗灑掃庭院等務。果真有目者無異。可謂盲目不盲心矣。”⁽⁴⁰⁾到1914年時，“學校已有一百四十名盲女受到差會姊妹的關懷”；到1915年時，設辦有師範班，“以備他處聘請，現有村落二所，設普通小學校內，添招瞽生一班，即以該院之師範畢業生為教員”⁽⁴¹⁾，並在香港島和廣東的一些地區設立分校。該校後改稱“九龍心光女子書院”，為現在的“心光盲校”的前身，仍屬喜迪堪會，1961年起接受香港政府補貼。

四、奉天重明瞽目女學堂 (Industrial School For Chinese Blind Girls, Moukden)

由“大英聖書公會”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的德儒付 (R. T. Turley) 夫婦創建於1902年⁽⁴²⁾，校址在盛京 (瀋陽) 二道溝西。1904-1905年，因日俄戰爭影響，暫時關閉，1906年，作為一所較正規的教學機構重新開張。學生在校學習閱讀和寫字，經過三年的文化教育後，還要去工藝部實習編織等實用技藝。⁽⁴³⁾學校初辦時，為男女生兼收，但男生僅為個別，待其年紀稍長，為防止男女生混雜引起社會公議，於是將其送往北京瞽目通文館。略後，學校乾脆成為專門女校，不再接收男生，“專授女子之盲者，以凸字及織紉手工。”⁽⁴⁴⁾音樂也是基本課程，鼓勵一些聰慧女孩學習樂器演奏。學校在民國後改稱“瀋陽重明女學校”，並受到中國地方政府的資助。1913年時，學校有二十八名學生，這時，德儒付夫人已經成為學校的榮譽監督，學校的主要教學工作是由三名“稱職的中國女教師”擔任。⁽⁴⁵⁾1919年前後，學校被一個由差會、有關的歐美團體以及中國贊助者共同組成的委員會接管，具體校務則轉交給基督新教的另一來華差會——丹

麥路德會 (Danish Lutheran Missionary Society) 的宣教師主理。⁽⁴⁶⁾

五、長沙瞽女學校 (School for Blind Girls, Changsha, Hunan)

由“立本責信義會”(Liebenzeller Mission) 的庫穆小姐 (P. Kumm, 長沙當地人習稱“甘女士”) 創建於 1908 年。“主要是基於一種對那些無助盲女的深深同情，這些盲女得不到愛也得不到關懷，而處在一種極為惡劣的生活狀況下。建校的目的是使這些盲女有一個舒服的家，並傳授給她們知識，為她們的未來能夠依靠自己的力量較好地生存於世進而成為有用的女性建立基石。”⁽⁴⁷⁾ 學校還請一樊姓女教士協助辦理，“有女生三十餘人，月費四圓，工於編織絨線各技”，文字課程則“專讀聖經，略授他種科學”。⁽⁴⁸⁾ 學校初辦時，社會並不關心她們，但是，短短幾年後，情況有了很大變化，“地方報章裡不時有學校的報道，而且指責中國人自身為甚麼沒有創辦此類特殊教育機構。來自雅禮學院的中國基督徒學生也訪問了學校，並給盲目的女同學們帶來豐富的禮物。”⁽⁴⁹⁾

六、廣州慕光瞽目院 (School for Blind Girls, Canton)

由美國浸信會 (Foreign Mission Board of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的威靈女士 (Miss Lula Whilden) 創建於 1909 年。⁽⁵⁰⁾ 她是一名早年在廣州的宣教士的女兒，回美國受教育後再次返華，可以說是來華傳教士中的第二代。這批人因為長時間生活在中國，故而對中國有感情，每每視為第二故鄉，同時，也對中國的社情民意更熟悉，瞭解中國的最需要。學校創辦初期，曾在廣州寺貝通津等地進行教學，但校址不固定，“人數亦寥寥。因地址無着落，遂寄讀於芳村明心書院，一至假期，遂漂流無定”。威靈女士於是“久有另覓一地安置顛連無告之盲女之心”。適時，在廣州的美國傳教士紀好弼博士 (Dr. Graves) 與其夫人 Janie L. Graves 要回國休假，紀夫人也是廣州傳教士圈子中有影響的人物，曾充任廣州培道女校校長三十餘年。威靈女士便將學校困境告訴紀夫人，紀夫人

“聞及安置瞽女之舉，非常表同情，且捐鉅款為之倡”，返美後又代為募捐，得到美國密西西比州藍山大學 (Blue Mountain College) 的鼎力支援，於是在廣州東山署前路購地建校。1919 年秋，學校落成。不久，威靈因病回國，校務完全由紀夫人主理。“幸而當時藍山大學及其他禮拜堂主日學團體，及私人等，仍繼續捐助，而校務得繼續不輟。”⁽⁵¹⁾ 學校的招生原則是，不論其父母是否為基督徒，祇要年齡在 5-15 歲之間的一律收納，在歲數年限之外的盲生，經特別許可，也可收錄；但又規定，“凡經作不正當生涯者，一概不收”（這與前述的明心瞽目院有重大區別）。紀夫人管理慕光瞽目院一直到 1935 年，後因失明退休。其在中國的華南地區“服務四十七年，於 1935 年回到了本鄉密西西比州，凡中西與她相識的無不景仰”。其退休前，學校已經“有寬敞的樓房及周備的器物，已有三十年的工作，成績很可以說是‘斐然’”。紀夫人離校後，學校由廣州東山浸信會負責管理。⁽⁵²⁾ 抗日戰爭期間，學校因廣州淪陷停辦。⁽⁵³⁾

七、廣東肇慶瞽目女校 (School for Blind Girls, Shuihing)

由美國聖道會 (Evangel Mission) 於 1909 年創建，1915 年時有學生三十六人，瞽女教員兩位，所開課程有聖經、凸字、彈琴、唱詩、織造、搓線、針線等，另有中國的《三字經》讀本，規定學制八年。其經費來源主要依靠差會撥款和外人捐贈。1933 年時有學生四十二人。此外在該縣西南還有聖靈會創辦的非正規的瞽女學校一所，附設在育嬰堂內。⁽⁵⁴⁾

八、廣東嘉應 (梅縣) 心光女校 (Hildesheimer Blinden Mission, Kaying)

民國二十三年出版的《廣東全省地方紀要》有一段文字：“有德國喜延〔迪〕堪會設立之心光女校，專招盲目婦女，授以生活技能，自民九開辦以來，成績甚著。”⁽⁵⁵⁾ 此段記錄除學校開辦時間的記錄有誤外，其餘創辦差會等內容大致不差。德國喜迪堪會在中國的傳教範圍不算大，但在其活動區域內卻尤為關懷中國的弱勢群體，曾在廣東和香港設有多

所盲校。喜迪堪會與另一個德國來華差會—巴陵會的活動經常有交叉復工的情況。1884年，巴陵會的庫普(Lily Cooper)作為傳道嫫嫫來到香港和廣東，那些病殘的女性引起了她及同事們的關切，並對中國盲女寄予深深的同情。庫普小姐1886年因病返回德國漢諾威，在家鄉仍為差會工作，也愈來愈迫切地感到要援助那些中國的盲人姐妹，1889年，專門寫作出版了《在中國婦女中間的德國差會》(The German Mission among the Woman in China)一書，書中提到了中國盲女的慘況，引起各界關注，這年秋天，在德國，喜迪堪會的成員製作了衣物來為中國盲人進行義賣，後來有愈來愈多的人參與此項活動，義賣所得和人們捐助的錢款也與日俱增。略後，喜迪堪會在廣東的負責人哈特蒙(Hartmanu)牧師、葛特凱(R. Gottschalk)牧師等也全力推進此項事業。⁽⁵⁶⁾梅縣盲校就是在此背景下出現。該校1912年由德國喜迪堪會創辦⁽⁵⁷⁾，後逐漸擴大，1922年時已有學生五十九人。分幼稚園和手工藝班等，學制八至十年。20世紀30年代後，在多數盲校從早先的免費教育改為收費教育，將盲人教育從義務階段轉向權利階段的情勢下，該校仍難能可貴地堅持實行免費教育，“學膳等費概由該會供給。學生畢業後如無家可歸，或無以維生者，仍准留校。近因辦理已久，耗費殊多，支持頗苦。”⁽⁵⁸⁾該校1950年後改稱“黃塘盲人學校”。

九、武昌協合女子盲童學校(Union School for Blind Girls, Wuchang)

1919年，基督協會的美籍瑞典傳教士艾瑞英基於“挽救那些無助的盲女們，她們要麼是孤兒，要麼遭家人遺棄，要麼靠出賣肉體維生”，在湖北武昌大朝街創辦此校。⁽⁵⁹⁾學校“設辦的目的是讓盲女們也能享受到基本的教育，訓練她們的手工技能，使她們能夠依靠誠實正當的勞動維生，重新回歸社會。”⁽⁶⁰⁾開辦時僅四名瞽女，後逐步發展，學生多時有五十多名。學校為初等教育層次，學制七年，課程設國語、算術、常識、歷史、地理、音樂、體育、手工、公民、聖經課等。1929-1932年辦有一期初中班⁽⁶¹⁾，1940年辦有一期手工班，專習毛衣

等編織技術。1951年9月18日，該校由中國人民救濟總會武漢分會接管，改為公立。⁽⁶²⁾

除了上列學校外，還有一些教會人士設辦的規模較小的盲女學校在各地存在，如1907年由巴色會(Basel Mission)在廣東韶州開辦的德華盲女學校；由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分別於1908年在湖南長沙開辦的女子盲童學校，以及1910年在廣東高要開辦的瞽目女校，1917年由聖公會在山東兗州開辦的聖瑪利盲人學校，1918年由聖潔會(Canadian Holiness Movement Mission)在山西朔州開辦的盲校，還有由長老會(Presbyterian Mission)的葛瑞翰小姐(Graham)創建的福建泉州盲校，由中華博醫會(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在廣西桂平開辦的盲女學校，由信義會(Augustana Synod of the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of North America)在廣東德慶開辦的瞽女學校，等等。但這些學校，大多規模過小不甚正規，有些甚至是短期舉辦旋即解散。有教會同工人士對當時中國的盲校作總結時指出：“以上十餘校，同施一線光明於盲界。”⁽⁶³⁾

盲女學校的特殊意義

毋庸贅言，盲女學校的創辦表達了一種人類的博愛思想和教中人士的宗教慈悲情懷。諸多學校的創辦索性就是為了拯救那些淒慘的盲女。廣州明心盲校的創辦人馬西女士，在晚上出診時，就經常遇到濃妝豔抹的盲女，遊蕩在一些不良場所。廣州的葛瑞斯(Graves)醫生寫道：那些不幸的生靈還在為一個老婦（實際上即是老鴿）賣命，她們的命運甚至比奴隸還要不如。我看到老鴿將一名盲女推倒在地用棍棒抽打，而另一個則被扔進河裡，後被我們搶救，還有一名盲女則央求我們搭救她，她已經被折磨得遍體鱗傷。⁽⁶⁴⁾瀋陽重明女校校長也就盲女教育問題發表專論強調，在所有的殘疾人中，以女性盲人的地位最為低下，生存狀況最為淒慘，“中國失明女童正在大聲地向教會呼救”。⁽⁶⁵⁾該校的創辦人德儒付先生也在刊物上發表文章，聲稱

積他二十年在中國特別是東北的經驗發現，中國盲人女性的數量遠比人們所能想象的要多得多，因為更多的盲女們往往被認為會給人帶來黴運等原因而被圈在家中，與世隔絕。後來盲女們也因此變得心理孤獨和身體虛弱，極易染病。盲女們在財產上也受到歧視，即或家境較好的盲女也不可能得到較豐厚的嫁妝，她們對配偶的選擇也大多是“歪鍋配歪竈”，找一些和她們一樣的瞎子，或是找不到老婆的跛子之類。若是盲女的母親死了，她的境況更會雪上加霜，姊妹們通常不會照管她，她將求助無門。於是乎，誰喪失了視力，誰就意味着短命，逃過此劫，直如奇跡。眼睛的失明帶來的是系列災難：社會歧視，家人遺棄，窮困潦倒，生計無着，最終是死亡。所以，很多家庭在孩子生下來後發現是眼瞎時，就在嬰兒時溺殺了。⁽⁶⁶⁾ 1890年，曾駐香港巴陵會又駐倫敦等地的華人牧師王煜初曾為中華瞽女作〈訴苦文〉，文中用摧人淚下的言辭極言盲女之苦，這篇〈訴苦文〉旋被差會譯成多國文字廣泛寄送各歐洲國家，文曰：“吾料天下之瞽目，無有慘於中國之瞽者。而瞽中亦無有慘於盲女。（……）當其學淫詞歌曲也，教之者百般虐待。故夜間不敢留一刀一索於其臥房，甚至束褲之帶亦撤之，蓋恐其自縊也。及學成彈唱之技，則限其每晚要賺錢若干，方得回歸，則其愁慘之情形，可一言以蔽之曰，迫其作無恥事，強售其身靈於魔鬼，其淒涼尚有甚於此乎！”⁽⁶⁷⁾ 1900年4月，在紐約召開的基督教普世大會上，美國長老會代表康耐翰（A. M. Cunningham）發言：“有很多的盲人女孩，她們被送進妓院，在她們的身體已有缺陷的情況下還要剝奪她們精神的純潔。”⁽⁶⁸⁾ 1907年的基督教來華差會上海大會又將此議題討論，有人不無激忿地說：“改善這些可憐的盲女們的命運，給她們以特別的關愛和惠利，並以她們的範例來教育我們那殘缺的良性，不正是我們每一個基督徒應負的責任嗎？”⁽⁶⁹⁾ 1914年，傅步蘭又發表文章述說所謂“盲人村”的狀況：“有許多盲人集中在那兒，其中的盲人幼女們往往是無助的，她們要麼在幼年的時候就被家人遺棄，要麼被出賣到某些不道德的場

所。”傅氏呼籲：“現在在中國從事盲人教育具有某種緊迫性，特別是對盲人中的女性。教會方面為明目的人建立了從幼稚園到小學、中學又到大學的體系，但是對盲校的關注卻遠遠不夠。”⁽⁷⁰⁾ 作者還認為，由於中國重男輕女溺殺女嬰的傳統惡俗，相比起男校來說，盲童女校的設辦更為切要：“皆緣為父母者，重男輕女，女盲孩每於初生時謀殺之。如全國設有盲童學校，則父母何必因女而猝其生，是更為上帝造一生人之德也。”⁽⁷¹⁾ 1936年4月2日，《中國評論》還發表了文章，例舉中國盲人這個不幸階層的歷史，說明依照中國的舊俗，男算命、女為娼是盲人男女的傳統行當。文章認為：盲人教育機構對於中國的盲女們來說具有最為重要的意義，因為在中國社會中，她們是受到最深歧視的群體。⁽⁷²⁾ 上述言辭說明，對中國盲女狀況的同情是教中人士設辦盲女學校的重要原因，盲校的設辦相當程度上就是為了改變個中狀況。

但若是將教會盲女學校的創辦僅僅歸於宗教的慈悲情懷，那也太低估了盲女學校在近代中國社會的存在意義。特殊教育是人類社會進步的產物，它使盲人能夠感覺五彩繽紛，弱勢群體不再弱勢，殘疾人群殘而不廢。在人類自身進化的歷程中，特殊教育產生的偉大歷史意義是怎樣地估價也不會過份的。但是，殘障人的教育又是一種對從事者回報很少甚至沒有回報，卻是對社會和人類有極大回報的事業。近代以還，教會人士創設的特殊教育至少具有三種特性——

一、先導性。近代意義的特殊教育，為中國自古所無，“我國數千年來，於盲人列之殘廢，矜其無告，僅有養而無教。能司其職者，以樂官樂師為著，次則雜廁於卜命星相之流。”⁽⁷³⁾ 直到教中人士將特殊教育引入中國，局面才為之一變。特殊教育一產生就具有國際性，它是於歐美先誕生，才推廣到亞非拉其它國家，而在近代中國，傳教士又是率先來到中國的一個力量很大的群體，他們有教會作為背景，有西方的經濟支援和文化資源作為依賴，故而，中國近代特殊教育機構最早由他們興辦有某種特定的原因。特殊教育不僅對殘疾人本人，而且

對其家庭和後代生活質素的提高都有作用，這一點對盲人女性來說更是如此。特殊教育從女子發軔，是中國特殊教育事業發展的特點，也是優點。特殊教育還體現了社會的公平性，向包羅無遺的人類所有群體打開受教育的通途，正是近代教育與中古教育的根本不同點。聯繫到直到1909年，才有中國教徒創辦的保定盲啞學校的出現，1916年才有湖南導盲學校和南通盲啞學校作為非教會特殊學校的出現，而到1927年，才有中國第一所公立的“南京市立盲聾學校”出現的事實，教會向中國的殘障人首開教育大門，堪稱中國近代殘障教育的先導；向中國的殘障女性首開教育大門，堪稱中國近代女性教育的前驅。這些盲女教育機構還為中國提供了近代女子特殊教育的基本範式，從教育對象到教學人材，從教學手段到學制課程，從教材到教具，從學校與社會的溝通到職業培訓，在在提供了樣板。其後，中國人自辦的特殊學校基本是倣倣而來。

二、主導性。教會特殊教育在1949年前的中國始終是特殊教育的主流，它在20世紀之前是唯一設辦主體，在20世紀初葉中國人自辦的特殊教育機構興起之後，也始終佔據主導地位。即使從數量上來說，教會特殊教育機構也長期居於主要位置。“我國盲人之總數，當在千分之一左右，總計全國現在盲校僅有四十餘所，其為國人所自辦者，不過四分之一而已。”⁽⁷⁴⁾這是抗日戰爭前的比例。之後，雖然非教會特殊學校有所增加，但以教會特殊學校為主的格局沒有改變，據1948年的統計，斯時全國有公立盲聾啞校八所，私立校則有三十四所，在私立校中，又以教會人士經辦的佔多數。⁽⁷⁵⁾這便是近代中國特殊教育事業的基本面相。而在上列盲校中，專門面對女性的盲校基本上均由教會設辦。

三、衝擊性。教會設辦的盲女學校對中國人的若干不良傳統習俗形成衝擊，個中典型者如男尊女卑的思想、歧視婦女的思想。出於傳宗接代、光宗耀祖和家族宗廟繼承人的考慮，中國文化的重男輕女觀念源遠流長根深蒂固。財產的繼承、金榜的題名、官宦的顯赫、人丁的興旺等等榮耀幾乎都與女性無緣，女兒身在傳統中國幾乎從一誕生就受到漠

視和冷遇。女性處在這樣的社會低微位置，對婦女虐待現象的普遍存在便是不奇怪的。在中國的貧困階層中殺死女嬰的比例是很高的，在美國的比例是1,300嬰兒中有一例，在歐洲是800-1200個嬰兒中有一例，在印度是500個嬰兒中有一例，而在中國不超過400個嬰兒中就有一例。⁽⁷⁶⁾需要強調的是，以上所說的都還有一個前提，那就是這些女孩的身體都是健全的，若她們是殘疾人的話，其境遇則更可想而知。有來華傳教士曾發現：“如果女孩不是盲人，那麼，她們的母親就會訓練她們的舉止儀表，以便將來締結一門美好姻緣。但是，如果女孩是盲人的話，那麼，一切希望都被滅了。失明女嬰或被家人拋棄，或被毒殺溺死，或轉賣他人，盲女們一經出生也就決定了她們今後的命運。”⁽⁷⁷⁾在傳統中國，女性處於弱勢地位，殘障人群處於弱勢地位，而殘障的女性特別是盲女更是處在雪上加霜的極弱勢地位。以教育而言，傳統中國的正常女性歷來遵循《禮記》“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的古訓，自由外出已然不可，接受正規教育更是不可能的。即便進入20世紀後，清政府在1903年頒行的《奏定蒙養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中仍然規定：“中國此時情形，若設女學，其間流弊甚多，斷不相宜。”⁽⁷⁸⁾女學依舊缺乏法律地位。1905年，杭州的惠興女士竟然因創辦“貞文女校”難以為繼，祇好以自殺來殉學警世。⁽⁷⁹⁾那還是面對正常人的普通學校，更遑論針對殘疾女性的特殊女學了。正是在這樣“以無教育之惡名譽聞於世界者，中國女子其一也”的社會環境下⁽⁸⁰⁾，我們看到了一個令人驚詫而又感動的現象，那就是在教會設辦的特殊教育機構中，女校恰恰佔到了大多數。正是因為中國殘障女性流離失所的機率最高，故而教會方面把殘障女校的創辦視為特殊教育事業中的重中之重，這是極難能可貴的。突出女學的特點在早期表現得尤為突出，根據民國二十三年的統計，特殊學校“歷年畢業者”：上海此前共畢業了十七名學生，全部都是女生；河北畢業了四十八名學生，也全部都是女生；湖南畢業了一百零四名學生，同樣全部都是女生；祇是福建畢業了一百零七名學生中，有二十七

名是男生，另八十名也是女生。此項統計當然不能說是全面準確，但能夠反映出此一時段某種概率趨勢是應沒有疑問的。(81)

【註】

- (1) 另有人提出世界上第一所盲校是由英國人愛爾登 (Edward Rushton)、瞽目音樂家快斯特 (J. Christie) 和亨白勒牧師 (Henry Barnett) 於 1791 年在英國建立。參《真光》第 38 卷第 7 期，上海：美華浸會書局，1939 年 7 月，頁 31-32。另按：早在 1892 年時就有傳教士向中國人介紹了英國的這所盲校，“若英國利弗布城 (利物浦) 之棲醫院創自中朝乾隆五十六年，其院中經費，每歲約需銀萬二千兩。”艾約瑟：〈棲醫院說〉，《萬國公報》第三十六次，光緒十七年十二月，上海，美華書局印行。
- (2) 詳參可克 (Samuel A. Kirk)、蓋利哥 (James J. Gallagher) 合著：《特殊教育新論》，臺灣，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1988 年中譯本。
- (3) 伯恩特·卡爾格—德克爾 (Bernt Karger-Decber)：《醫藥文化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4 年中譯本，頁 190。
- (4) *Chinese Repository*, Vol. 6, p. 232.
- (5) 容閔：《西學東漸記》，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頁 3-4。
- (6) 在澳門女塾開辦前後，也有英國東印度公司醫生郭雷樞於 1827 年在澳門自費開辦過眼科診所，還有美國來華的第一位傳教醫生伯駕 (Peter Parker) 於 1835 年 11 月在廣州開業“眼科醫局” (又稱“新豆欄醫局”)，為外國傳教士在中國大陸開設的第一所西醫醫院，然這些都是醫療機構，並非教育機構，郭雷樞本人也不是傳教士，故而此處不論。但這些醫療機構不約而同的都從眼科着手，從中反映出當時中國民間眼疾的嚴重，也說明了西人或是教會在來華之初就已特別關注到了中國人的眼疾問題。
- (7) 朱有熾、高時良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四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3 年版，頁 21。
- (8)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 London, 1929, p. 461.
- (9) 傅步蘭：《盲童學校》，《中華基督教會年鑒》第一期，1914 年，頁 132。饒有意思的是，儘管澳門很早就出現了特殊教育的萌芽或起步，但真正的正規的特殊教育機構卻成立得頗晚。若除開主要是救助而不是教育的慈善機關外，直到 1967 年，澳門才出現了第一所特殊教育機構，這就是基督教聖保祿學校，開始時也祇是兼收弱能兒童，又到 1978 年，該校改為專收聾啞兒童的“路德會聖保祿聾啞學校”，後又改名“協同特殊教育學校” (Concordia School for Special Education)，此乃澳門第一所特殊教育學校的定型。該校屬於非營利的私立學校，位於澳門筷子基美居廣場，由澳門協同福利教育協進會主辦，教育領域也由聾啞學校發展到其它弱能教育領域，學校的宗旨是：宣傳福

音，倡導教育事業，使學生在靈、德、智、體、群、美諸方面得到均衡發展，教導學生適應社會生活。參吳志良、楊允中主編：《澳門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出版社 1999 年版，頁 490。

- (10) George B. Fryer, “Work among the Blind of China”,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14, p. 317.
- (11) 佐佐木正哉：《鴉片戰爭研究》(資料篇)，日本，東京大版出版會 1964 年版，頁 145-146。
- (12) 福州來稿：〈福州盲童學校近況〉，《中華基督教會年鑒》第十一期 (上)，1929-1930 年，頁 111 (肆)。
- (13) *Chinese Repository*, Vol. 6, p. 232.
- (14) 參郭衛東：《基督新教與中國近代的特殊教育》，《社會科學研究》2001 年第 4 期。
- (15) Ecumenical Missionary Conference, *Report of the Ecumenical Conference on Foreign Missions*, New York, 1900, Vol. 2, pp. 242-243.
- (16) 《中華基督教會年鑒》第一期，1914 年，頁 133。另見 D. MacGillivray,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 Reprinted by San Francisco, 1979 (根據 1907 年上海版本)，p. 591.
- (17) 林女士：〈廣州明心瞽女學校志略〉，《中華基督教會年鑒》第二期，1915 年，頁 167。
- (18) Arthur Judson Brown, *One Hundred Year*, New York / London, 1937, p. 371。另參中國人民政協廣州市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州近百年教育史料》，廣東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頁 277-278。
- (19) Ecumenical Missionary Conference, *Report of the Ecumenical Conference on Foreign Missions*, 1900, Vol. 2, p. 243.
- (20) 《中華基督教會年鑒》第二期，1915 年，頁 167。
- (21)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 p. 591.
- (22) 《中華基督教會年鑒》第二期，1915 年，頁 167。
- (23) 《中華基督教會年鑒》第二期，1915 年，頁 167；《廣州近百年教育史料》，頁 278。
- (24)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14, p. 322。另參 Arthur Judson Brown, *One Hundred Year*, New York / London, 1937, p. 371.
- (25) 《中華基督教會年鑒》第二期，1915 年，頁 167；*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14, p. 323.
- (26) Arthur Judson Brown, *One Hundred Years*, New York / London, 1937, p. 371.
- (27) 廣州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廣州市志》，廣州出版社 1999 年版，頁 62。
- (28) 亦有稱該校創辦於 1903 年，參 Miss Lamb：〈福州明道盲童女校概況〉，《中華基督教會年鑒》，第十一期 (上)，1929-1930 年，頁 114 (肆)。
- (29) Miss E. Stevens, “Blind Girls' School”, Foochow,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14, p. 324.
- (30)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 p. 54.
- (31) 《中華基督教會年鑒》第一期，1914 年，頁 133。

- (32) Miss E. Stevens, "Blind Girls' School, Foochow",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14, p. 324.
- (33) Miss E. Stevens, "Blind Girls' School, Foochow",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14, p. 324.《中華基督教會年鑒》第一期，1914年，頁133。
- (34) Miss Lamb:〈福州明道盲童女校概況〉，《中華基督教會年鑒》，第十一期(上)，1929-1930年，頁114-115(肆)。
- (35) 參黃新憲：《基督教教育與中國社會變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頁170。
- (36) 早在1863年，由天主教修會嘉諾撒會(Canossa)的修女創辦了香港嘉諾撒盲女院。曾被稱為“香港第一所特殊教育學校”，但從其早期情況看，更多的還是具有收容慈善的性質，且屬於天主教會，不在我們的討論範圍。該院後改名“啟明盲童學校”，直到1987年才停辦。參梁民安：《香港視障教育概況》(一)，頁12。
- (37) (40) 薛姑娘：〈心光書院實錄〉，《德華朔望報》，1911年6月，第85期，頁1；頁2。
- (38) 參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澳門基金會2002年版，頁229-246，423-425，496，509等。
- (39)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 pp. 591-593.
- (41) 《中華基督教會年鑒》第二期，1915年，書肆，教務類別，頁168。
- (42) 《中華基督教會年鑒》1914年第一期上有文章稱該校創建於1904年(見該期雜誌頁133)，是誤說，該校的創建時間是1902年。
- (43) (45) Mrs. Frances A. Turley, "St. Nicholas' Industrial School For Blind Chinese Girls, Moukden",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14, p. 325.
- (44) 趙恭寅、曾有翼等著：《瀋陽縣誌》第一冊，臺灣，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據民國六年鉛印本影印，頁282。
- (46) 《瀋陽縣誌》第一冊，頁282。中華續行委辦會調查特委會編：《中華歸主—中國基督教事業統計1901-1920》中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中譯本，頁520。
- (47) Mathide Vassel, "School for Blind Girls, Changsha, Hunan",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14, p. 327.
- (48) 《中華基督教會年鑒》第一期，1914年，頁133。
- (49) Mathide Vassel, "School for Blind Girls, Changsha, Hunan",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14, p. 327.
- (50) 《廣州市志》，頁62。
- (51) 劉粵聲：《廣州基督教概況 兩廣浸信會史略》，香港浸信教會1997年再版，頁228。
- (52) 吳立樂：《浸會在華傳道百年略史》，上海，中華浸會書局1936年版，頁23-24。
- (53) 《廣州近百年教育史料》，頁278。
- (54) 上海新聞社編印：《一九三三年之上海教育》，民國二十三年版，頁59。
- (55) 廣東民政廳編印：《廣東全省地方紀要》第二冊，民國二十三年版，頁55。
- (56)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 p. 590.
- (57) 《中華歸主—中國基督教事業統計1901-1920》(中冊)，頁770。
- (58) 《廣東全省地方紀要》第二冊，頁55。
- (59) *The Chinese Recorder*, August, 1932, Vol. 63, No. 8, p. 469.另按：有材料稱該校是“天主教宣道會”所辦(見武漢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主編：《武漢市誌》(教育誌)，武漢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頁203-204)。此說法有誤，該校為基督教新教的差會聯合創辦。參《中華歸主—中國基督教事業統計1901-1920》(中冊)，頁770。
- (60) *The Chinese Recorder*, August, 1932, Vol. 63, No. 8, p. 469.
- (61) 參《一九三三年之上海教育》，頁59。
- (62) 《武漢市誌》(教育誌)，頁203-204。
- (63) 《中華基督教會年鑒》第一期，1914年，頁134。《一九三三年之上海教育》，頁58-60。
- (64)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 pp. 589-590.
- (65) R. T. Turley, "Work for Blind Girls", *The Chinese Recorder*, April, 1914, Vol. 45, No. 4.
- (66) Robert T. Turley, "Blind Girls' Industrial Home", *The Chinese Recorder*, December, 1918, Vol. 49, No. 12, pp. 822-823.
- (67) 薛姑娘：《心光書院實錄》，《德華朔望報》，1911年6月，第85期，頁1。
- (68) Ecumenical Missionary Conference, *Report of the Ecumenical Conference on Foreign Missions*, New York. 1900, Vol. 2, p. 243.
- (69) *China Centenary Missionary Conference*, Shanghai: Centenary Conference Committee, 1907, p. 93.
- (70) George B. Fryer, "Work among the Blind of China",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14, pp. 313-314.
- (71) 傅步蘭：〈盲童學校〉，《中華基督教會年鑒》第一期，1914年，頁130-131。
- (72) *The Chinese Recorder*, May, 1936, Vol. 67, No. 5, p. 320.
- (73) 達儒：〈提倡盲人教育之我見〉，《盲啞》(創刊號)，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十日，頁11-12。
- (74) 《盲啞》(創刊號)，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十日，頁11-12。
- (75) 楊家駱：《民國卅七年份中華年鑒》第五冊，臺灣，鼎文書局1973年版，頁1703。
- (76) George B. Fryer, "Work among the Blind of China",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14, p. 312.
- (77)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 pp. 589-590.
- (78) 舒新城編：《近代中國教育史資料》(中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頁385。
- (79) 〈惠興女士為女學犧牲〉，《申報》，1905年12月30日。
- (80) 金一：《女界鐘》，1903年版，頁37。
- (81) 《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鑒》丙編，教育概況，民國二十三年版，頁982。